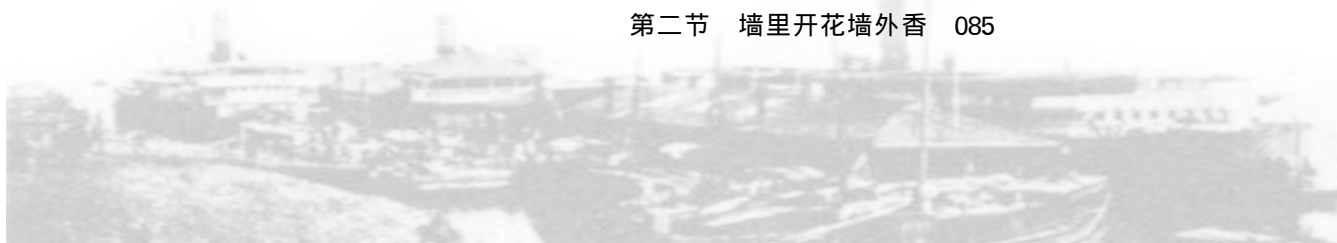


Contents

| | | |
|-----|---------------------|-----|
| | 第一章 江湖简史 | 001 |
| 第一节 | 从五斗米教到明清海禁——古代帮会的发展 | 003 |
| 第二节 | 侵略、租界和社会变迁——近代帮会的兴盛 | 009 |
| 第三节 | 其兴也勃，其亡也乎也——近代帮会的归宿 | 015 |
| | 第二章 帮会组织 | 021 |
| | 第一节 堂口 | 023 |
| | 第二节 帮规 | 027 |
| | 第三节 隐语 | 031 |
| | 第四节 进退 | 036 |
| | 第三章 帮会营生 | 041 |
| 第一节 | 烟赌娼和贩卖人口 | 043 |
| 第二节 | 保护费和代理收入 | 048 |
| 第三节 | 投资近代事业收益 | 050 |
| | 第四章 天下丐帮 | 055 |
| 第一节 | 天下第一帮 | 057 |
| 第二节 | 近代流民潮 | 065 |
| 第三节 | 一盘大散沙 | 071 |
| 第四节 | 善恶知多少 | 076 |
| | 第五章 沉浮——洪门的兴衰 | 079 |
| 第一节 | 反清复明天地会 | 081 |
| 第二节 | 墙里开花墙外香 | 085 |



江

湖

①
②
③
④
⑤

飘荡于江湖……
都慢慢倒下。裹上历史的尘埃，没有人明白，有这样的一群人曾经，生存与正义，死亡与游戏，主流抑或非主流，在刀光剑影中，

002

第三节 圆满的归宿 090

第六章 一手遮天——青帮 093

第一节 漕运发家 095

第二节 青帮组织 098

第三节 风云东南 102

第四节 齐聚上海滩 105

第五节 杜代黄兴 109

第七章 毁誉参半——袍哥 113

第一节 与子同袍，亲如同胞 115

第二节 投身辛亥革命 120

第三节 袍哥兴衰 127

第八章 会道门 131

第一节 民不聊生刀出手——小刀会 133

第二节 刀枪不入的神话——红枪会 143

第三节 面具背后的罪恶——一贯道 149

第四节 杀尽天下不平事——白莲教 155

第五节 京门在理人禁烟——理门 160

第九章 帮会人物 163

第一节 盐泉巨头——徐宝山 165

第二节 上海二张——张仁奎、张树声 170

第三节 流氓大亨——杜月笙 1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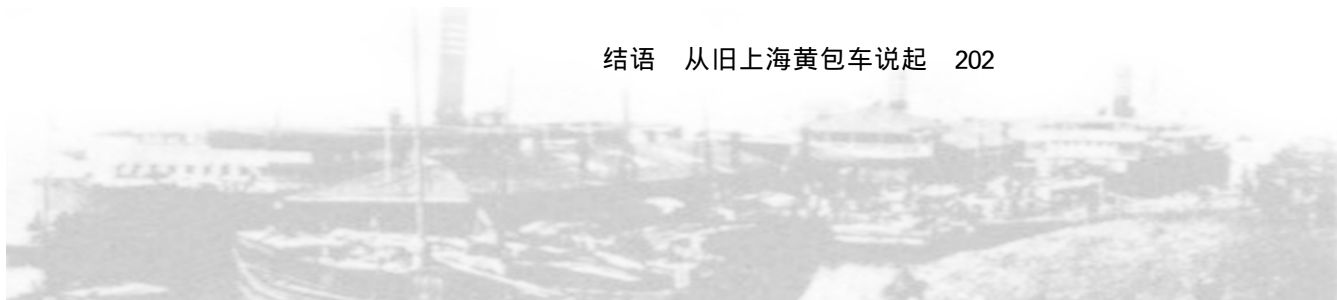
第四节 第一帮主——黄金荣 179

第五节 三色大亨——张啸林 186

第六节 海上闻人——虞洽卿 190

第七节 袍哥军阀——范绍增 197

结语 从旧上海黄包车说起 202



第一章 | 江湖简史

近年出版的《中国帮会史》的作者刘联珂先生，系洪门人士。他后半生一直潜心于洪门历史的研究，在 40 年代出版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对洪门历史作了系统和完整的记述，书中材料详实，称得上是中国帮会史中的权威巨著。刘先生认为：中国之有帮会，已经有三百年悠久的历史了。笔者认为的帮会历史，远远要比三百年要古老。

第一节 从五斗米教到明清海禁

——古代帮会的发展

帮会组织是江湖内部次级组织形式。江湖早有，江湖中人常有，而帮会组织则要晚得多。

庄子在其作品《庄子·内篇》中最早使用了“江湖”一词。在作品形成的春秋战国时期，是社会剧烈动荡，社会分化严重的时期。政治权威的动荡，松动了正常的社会组织，产生了大批难以归类的士、侠、游商等人。一个原始的江湖逐步剥离出来了。

荆轲、高渐离等人仗艺游荡各国，专渚、聂政等人行刺各地，加上社会对这一群体或多或少的推崇，使得早期的江湖萌芽发展迅速。根据记载，墨子学派就围绕思想学说，形成了严格的组织体系。他们有严格的纪律，违禁者轻则开除，重则处死；同时墨家子弟的生活起居，行为举止都要受到“巨子”的操纵。有人将墨子学派作为中国帮会的始祖。现在看来，这一学派的确同其他的学术团体不同，内部关系密切，但是他们依然是以学术思想为核心的正常社会的一部分，算不上是江湖组织。真正形成江湖的年代，还要追溯至西汉末年。

公元17年，王匡、王凤等人在天灾人祸民不聊生时率领饥民攻占地主宅院，夺取粮食，发动了起义。起义军以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为根据地，因此被称为“绿林军”。从此“绿林好汉”就成为除强扶弱、劫富济贫的侠义英雄的代称。同时期的“赤眉军”还创造出了“杀人者死”等简单的纪律，这应该算是江湖道义的起



江

湖

中
国
近
代
帮
会

飘荡于江湖……
生存与正义，死亡与游戏，主流抑或非主流，在刀光剑影中，都慢慢倒下。裹上历史的尘埃，没有人明白，有这样的一群人曾经

源。当时的绿林军也好，赤眉军也罢，都是带有改朝换代性质的政治军事组织。

这么多年的酝酿，最终在张陵的手中塑造出了原始的帮会胚胎。东汉顺帝时，江苏沛国人张陵客居四川，针对当时灾荒频繁、瘟疫猖獗、百姓饥谨、民不聊生的形势，在四川鹤鸣山依据《太平经》作道书，自称出于“太上老君”口授，将民间巫术与巴蜀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原始宗教成分相融汇，创立了“五斗米教”。五斗米教的宗教内容和形式，主要是祈福和驱鬼，假借鬼神、符、禄为人治病，聚徒惑众。因其入教条件是缴纳信米五斗，以“防凶年饥民往来之乏，行来之人不装粮也”。具有互助性质，故广大贫苦百姓纷起响应，“竞共事之”。由于“五斗米教”具有浓厚的原始性、民间性和联盟性，遂逐渐演化成农民起义的旗帜。另一方面，它也凝聚了江湖的规范因素，创立了原始的帮会组织。

到东汉末年，“五斗米教”分支道首张角，在河北、河南、山东、江苏一带传播“太平道”，用“符水咒语以疗病，百姓信向之。”张角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政治口号，聚教徒几十万人，发动起义，遍及八州，焚烧官府，捕杀官吏。公元184年出现的黄巾起义将原始帮会组织和反政府的农民起义相结合。张角、张宝、张梁三兄弟的起义将风雨飘摇的东汉王朝推到了崩溃的边缘，但还是没有彻底推翻东汉政权。在长达30多年的斗争中，黄巾军将反政府、实践理想的意识传播到了全国。黄巾起义让生活困苦不堪的农民和小商小贩等社会底层民众主动自觉地联络，并在躲避官方追查的联络中创造出了很多特殊方法和规矩，这些都成为江湖道义和规矩的渊源。

时间到了魏晋之季，宗教大为兴盛，开始了宗教与帮会组织的不解之缘。宗教在推动帮会发展完善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历史作用。自佛教传入我国之后，随着封建统治者的崇奉和在民间的普遍流传，魏晋南北朝时，“沙门异端纷起”，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广收信徒，蛊惑人心。在山西、河南一带，有人利用宗教曾



掀起过多次武装暴动。在累遭封建王朝镇压后，遂于民间秘密繁衍滋生，门派各异，邪说纷呈。但大都以“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出世”，“称之为奸”。

隋朝初年，民间广为流传着“吃菜事魔”的说法，信者多“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其后，唐县人宋子贤利用幻术，“自称弥勒佛出世”以迷惑群众，原始的白莲教组织因此产生。唐朝时有“白衣长发会”流行甚广。这一时期，随着城市的发展，民间非正常团体有了新的发展。正式的“社”开始出现。一些城市中出现了类似于现代黑社会成员特色的文身恶少。

宋元时期白莲邪教在民间就很兴盛，“吴郡沙门茅子元，自称白莲导师”。元末世乱，多少枭雄利用宗教和帮会组织武装与元兵相抗。其名称除白莲教外，还有弥勒教、大明教等等。为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大肆宣扬“明王出世”，“弥勒降生”。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起事之初虽参加的是“红巾军”，但当羽翼丰满时断然与红巾军划清界限。他出身沙门，并不真心信教。谙于世事的朱元璋明白历史上以宗教、帮会而成大业者从来就没有，只有吊民伐罪，解民倒悬者才能得民心，得天下。帮会对正常社会和政治统治的危害使得掌握政权后的朱元璋在即位伊始，便下令取缔一切“邪教”，以法律规定，“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但也正是在朱元璋开创的明朝时期，帮会组织开始成熟，并介入海外贸易事业。明朝强化以农立国，强力限制商业发展。海外贸易利润极大，又是一个复杂的行业，大量贸易纠纷需要调处。明朝厉行海禁，政府不愿意介入，若干大船主于是在福建、浙江近海岛屿上设立仲裁法庭，以武力为后盾，作为海外贸易秩序的维护者。这些人逐渐聚拢人力物力，开始形成规模组织，有时间也干干杀人放火的勾当。尤其是内地商人拖欠款物的时候，海商不能寻求政府的保护，只能一抢了事，因此他们都被混称为海盗。明中期的王直就是其中的著名人物。这些中国船主和帮主与日本浪人武士结合，成为明代倭寇。当中也有纯粹的中日海盗，但多数是混在其间的沿



江

湖

中
国
近
代
帮
会

飘荡于江湖……
生存与正义，死亡与游戏，主流抑或非主流，在刀光剑影中，都慢慢倒下。裹上历史的尘埃，没有人明白，有这样的一群人曾经……

海帮会势力。

我们不妨以明朝末年的郑芝龙家族为例。郑芝龙，福建南安人，19岁开始随船队来往于日本长崎和福建之间，后来逐渐拥有自己的船队和私人武装。一时间，南到暹罗湾，北到日本海，各大港口都能看到挂着“石井郑氏”牌照的船队。郑芝龙把总部设在日本长崎，后来和日本政府发生冲突，又率领势力移驻到台湾，在北部建立了据点。在全盛时期，郑氏控制了台湾海峡地区、中日之间的贸易，并向由西方而来的各国船队征收赋税。后来，郑芝龙想从政，于是跑到大陆，先后接受南明、清两代政府招安，最后死于清军之手。郑芝龙之子，出生在日本的郑成功继承了父亲的组织和势力范围，但忠于明朝，孤悬海外。他为反清复明而创立天地会——洪门组织系统，被尊为近代多数帮会组织的始祖。

刘联珂先生说的三百年帮会历史可能是洪门的历史。洪门是中国近代帮会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帮会。青帮、洪帮、袍哥等许多帮会都是从天地会——洪门系统发展起来的。

天地会——洪门是明朝残余势力为反清复明而创立的，是明清之际民族矛盾尖锐斗争的结果。其最早发源于福建漳州地区，由漳浦县洪二和尚郑开首创，对外称“天地会”，即“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之意；会内通称“洪门”，以“五点二十一”作隐语暗号，有流诗曰：“洪水漂流于天下，滴血盟心本姓洪”，谓称“洪家子弟”。

洪门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旗帜，初期依靠抗清名将史可法和黄得功，发展到数万人，后被清兵所败。会首洪旭和蔡德忠等率残部投奔在台湾的郑成功，重整组织。郑成功鉴于当时部属朝秦暮楚军心不稳，为加强团结，一致抗清，遂于1661年创立金台山明远堂，与众将士结为异姓兄弟，以“明大复心一”作暗号（反读即“一心复大明”），此乃洪门开山立堂之始。郑成功的本意是希望重振洪门帮会，协助台湾抗清。

洪门天地会在总堂主陈近南主持下，发展到1749年，声振华

夏东南。后由堂主苏洪光主持，召集各山堂于广东惠州高溪庙集商举义，并将组织定名为“三合会”，即以“天为父，地为母，日月为姐妹”，取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一之意。洪门此次大举起兵反清，连战连捷，声振东南七省。四川总督王春美见“三合会”军威势大，力敌无望，遂派奸细诈降作内应，两军于重庆交战，三合会大败。此后，三合会残余部分散到各地开山立堂，山头林立，势力遍及内地各省及南洋各埠。各山堂均以洪门反清复明为旗帜，不断举行起义，势力较大的有九华山、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双刀会、三点会、串子会等。

清朝的海禁甚于明朝，也成功得多。强化的政治统治使得帮会组织的活动转向国内。乾隆中期以后，土地兼并盛行，人口迅速增长。落后的社会经济状况，难以承受由于人口的急剧增长而造成的巨大压力，加上官府及地主豪强的掠夺，农民内部阶级分化的加剧，使农村出现大量过剩人口。其中除一部分到异地他乡开荒种地，继续作为自耕农或佃农而存在外，大部分流入本地或外地的城镇市圩。中国人口的增长超过了正常社会和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当时中国的城市大多是消费中心，工商业规模狭小，难以容纳更多的劳动者。涌入城镇的农民，只能充当小手工业者、小商贩或雇佣劳动者。一些缺少资金和技艺者，便成了没有固定职业的江湖流浪者。他们势单力薄，且身居异地，孤身无靠，只有彼此联合起来，才能求得生存。大批人口被甩出正常社会之外，为帮会势力的壮大大开方便之门。因此，乾隆时期各种名目的秘密结社纷纷出现。

这一时期，漕帮开始兴起，发起来了另一系近代帮会组织。清朝由水路往京城运粮或运送军粮，创建了完备的漕运体系。京杭大运河全线繁忙。漕帮依运河而兴盛，沿途大部分船民都加入了帮会。

2006年5月，山东临清市发现了一块刻有运河漕帮协约的石碑，为当年漕帮共同遵守的条例，为我们揭开了漕帮的大概情况。石碑高1.6米，正面刻着约定，阴面刻着建碑过程及漕帮成



江

湖

①
中
国
近
代
帮
会

飘荡于江湖……
生存与正义，死亡与游戏，主流抑或非主流，在刀光剑影中，
都慢慢倒下。裹上历史的尘埃，没有人明白，有这样的一群人曾经

员名单，名单有数百人之多，碑的发掘地就在临清运河边上。临清自明代设卫，是南北通航的重要关口。明清称“南有苏杭，北有临张”，指的就是临清和阳谷县张秋镇。近代又称其为“小天津”。

临清石碑记载，立碑年份在清乾隆初年，也记录了当时将协约文字拿到天津，天津的漕帮刻成此碑的经过。石碑经运河到临清，安放在大王庙内。大王庙是几处漕帮的人一起建的，外面挂着灯笼，如果灯笼放下，各地帮会就都要来大王庙议事。协约还有在运河行船中互助互救的规定。无论是新人入帮还是解决帮内的一切事务，都在大王庙的协约碑前解决。碑上还刻有押运船队的清绿营军与帮会共同立约立碑的过程。在刻有几百个漕帮成员的名单中，还首次发现了雍正末年清军在运河起点杭州拱宸桥追剿的几百名漕帮人员的名字，由此明确了漕帮成员逃脱清朝追捕后的行踪。

这表明在清朝中期，帮会就已经发展成为相当规模的、成熟的组织体系。近代前期的帮会发展，具有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它接纳了大量正常社会抛弃或边缘化的人群，形成了自己的组织和规则；一方面，在统治阶级横行无忌、残害百姓的情况下，帮会中也的确出现过一些杀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江湖好汉。他们以恶制恶，反抗强征暴敛、草菅人命的官吏，对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奸臣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一方面，所有的帮会组织都出现于特定的历史背景。近代之前的帮会远不是“黑社会”组织，而是中国历史的特殊部分，甚至是带有进步色彩的。



第二节 侵略、租界和社会变迁

——近代帮会的兴盛

近代之后，中国进入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激烈动荡。大批人被正常社会所甩弃，不得不进入帮会组织。而动荡的环境也为帮会组织大展拳脚提供了舞台。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废除武举。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分为文举和武举，武举是专门选拔武官而设置的科目，由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废除，历时1200年。其考试程序与文举基本一样，只是内容与时间的不同。在中国科举史上，自唐以后，历来是文武两科，殊途并进。传说中的岳飞枪挑小梁王就是在武举考场中上演的。

清末面对近代枪炮和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朝野上面兴起了废除武举的奏议。光绪二十四年（1898），当时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奕劻于七月二十七日奏请改革武举。其部分奏折如下：

“博采众长，酌中定制，综其大要，盖有三端：一曰稽名籍；二曰严考试；三曰杜流弊。请为我皇上详陈之：武举武生童等，好勇尚气，遇事风生，今令改试武器，如虎傅翼，人数既众，钤束虽施。至于枪价不贖，弊在糜费，枪制不一，弊在分歧。拟用张之洞等议。马步概用单响毛瑟枪，饬各省迅速制造，以塞漏卮。旧制以合式戳记印臂，房顶替之弊也；而顶替之弊终不能除，今内场既试论策，不可不加意防范，拟饬令各营、各学堂、各练局送考时，按名造具籍贯年貌箕斗清册，临场复用新样戳记印臂，派大员验年貌箕斗臂



江

湖

中
国
近
代
帮
会

都慢慢倒下。裹上历史的尘埃，没有人明白，有这样的一群人曾经，
飘荡于江湖……
生存与正义，死亡与游戏，主流抑或非主流，在刀光剑影中，

010

印相符，方准入试。其余一切关防，均视文场，则覆鼎既除，真才自出，不徒得一兵一卒之用矣。臣等所谓杜流弊者如此。”^①

奕劻认为武举与文举一样存在的作弊盛行的弊端，同时所学无用。当时一般百姓对武举，负面评价也多于正面评价，认为考试的内容不能符合时代的要求。奕劻认为可以“改试武器”，加强考试管理，防止冒名顶替现象。改革武举制度之成效，无法立竿见影；加以武备学堂的设立，创立了新的武官任职制度，影响了武举的任官制度。这些主要因素，最终促使千年武举制度的废止。

武举的废除让大批在正常社会中以习武为生，或想走武力道路的人群无以为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形势发展所抛弃，进入了非正常社会。帮会组织吸收了大量的武人，组织扩大，成员素质也大为提高。武举的例子仅仅是中国传统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而近代人口的大量过剩也是造成帮会组织膨胀的原因之一。人口自然增长、土地兼并和自然灾害的打击，造成了大量游民的出现（这在丐帮一章中将有详细记述）。以湖南省为例子，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的湘军系统裁撤官兵达数十万之多。19世纪60年代开始，大量退伍军人在湖南游荡。70年代后，左宗棠又从西北裁撤湘军，遣返几十万人回乡。面对这样巨大的人口压力，帮会组织吸收了其中的大部分力量。60年代开始，湖南省内习斋教者几乎无处不在。

清末连年战乱，民国建立后又即陷入军阀混战的境地，民不聊生。种种苛捐杂税让大批农民破产。这些破产的或陷于赤贫的农民，出路主要有两条，一是落草为寇，成为土匪；二是进入帮会组织，希望生存或自保。而统治者、地主、土豪也希望借助或控制帮会势力对抗其他帮会势力对自己的侵扰，这为近代帮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一度帮会还是革命党人的“同盟军”。多数帮会组织具有反清思想，这同革命党人的“革命排满”宗旨是相同的。因此，革命派

^①张晋藩：《中国官制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83页。

特别重视会党。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所订同盟会章程还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为同盟会会员，以此将联络会党作为一项政策。孙中山从最初从事革命活动时就开始联络会党。在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中，也“多以会党为主干”发动起义。黄兴也主张：“革命军发难，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为上策。”^①在革命中，帮会势力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也因为本身组织、行性方面的缺陷起了很大的恶劣作用。如何引导帮会势力的正面作用参与革命，一直是近代各个政党思考的难题。

在清末民初帮会组织的兴旺中，不得不提到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原称松江，是东海之滨的一个小渔村。自宋元以来南方经济的发展和海外贸易推动了港口贸易的逐渐繁荣，上海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吸引着各地客商的到来，其中以闽、粤、浙、鲁等地为主。“每日满载东北、闽粤各地土货而来，易取上海所有百货而去。”“商贾造舟置货，由福建厦门开船，顺风十余日，即至天津，上而关东，下而胶州、上海、乍浦、宁波，皆闽粤商船贸易之地，来往岁以为常。”乾隆时《上洋竹枝词》曾提到：“东门一带烟波阔，无数墙桅闽粤船”，“近日上洋风俗改，市人尽效嚼槟榔”。各地在上海经商的人员在不断增长。^②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被选为第一批通商口岸，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其中的畸形产物——租界，更是三教九流的乐园。上海开埠后，英、法、美等国为了谋求在华的特殊利益，设法获取了永远租用特别地区，并作为西洋人的居住和商贸区。《上海土地章程》第十六条规定，外国商人“亦不得建房转给华民租用”，这就是所谓“华洋分居”的具体规定。能留在界内的中国人，只是那些在界内拥有土地、房屋的原住民及为外国人服务的人员，数量十分有限。小刀会起义的一大结果是造成了租界的扩大和华洋混居局面的出现。大量逃难的富商、难民和帮会成员进入租界。殖民当局成立

^①朱云平：《朱执信与广东会党》，载于《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4月。

^②李国林：《小刀会起义与上海近代移民趋势变化》，载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3月。



江湖

①
中
国
近
代
帮
会

飘荡于江湖……
生存与正义，死亡与游戏，主流抑或非主流，在刀光剑影中，都慢慢倒下。裹上历史的尘埃，没有人明白，有这样的一群人曾经……

012

工部局，专营市政建设，允许侨民出租房屋谋利。工部局的权限和机构逐渐膨胀，也吸收华人参加。日后上海帮会老大黄金荣、杜月笙等人都混入了工部局，带领帮会组织以租界为根据地，影响蔓延至大江南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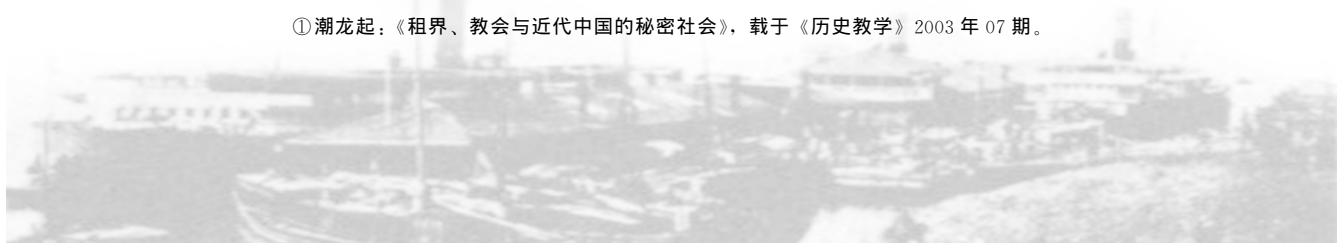
近代上海帮会活动较为频繁的地带就是集中在以下几个地带：洋泾浜沿岸、V家木桥、十六铺等。仔细分析这些地带，不难发现，它们恰恰就是上海“三界四方”交界的地段，如洋泾浜就是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界线。V家木桥是横跨洋泾浜上连接英法租界的八座桥之一，由于桥南的法租界巡捕不能涉足桥北，桥北的英租界巡捕也不能越界进入桥南的法租界捕人，所以，一河之隔，形同两国。因而，这里的流氓犯罪现象比较严重。“V家木桥的小瘪三”相当出名。上海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就是从这里发迹起家。十六铺是法租界与南市交界的地段，这里也是上海帮会滋生发育的一个主要场所，上海帮会中有名的帮会组织如大八股党、小八股党、十姐妹等都是在这一带聚集壮大的，上海滩上另一有名的流氓大亨黄金荣也是从这里发迹的。

另外，早期英美租界的分界线苏州河两岸，沪西法租界、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交会处等都是上海有名的腐化区和上海帮会的诞生地。在这些三不管的交叉地带，由于社会控制薄弱，卖淫嫖娼、聚赌抽头、走私贩毒、拐卖人口等各种非法经营较为猖獗，各种社会不良分子如游民乞丐、扒手流氓等也不断向这里汇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治安混乱。帮会势力利用了当政府之间的界隔与摩擦，大肆控制或经营各种地下经济，发展势力。

而租界当局希望招收有帮会关系的华人担任巡捕甚至进入工部局，协助管理，无异于为帮会势力蔓延大开了方便之门。正是由于通商口岸租界的设立，造成了上海华界及多国租界犬牙交错的空间布局，给上海帮会的兴起提供了较大的空间。^①

近代帮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区别于古代帮会的崭新特点。

^①潮龙起：《租界、教会与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载于《历史教学》2003年07期。



首先就是近代帮会的公开性。动荡和缺乏权威的社会使得帮会组织大摇大摆走上了“台面”，不似以前的遮遮掩掩。一方面，帮会组织名号公开，开展了一系列的公开活动。如民国时，闽侯县有一贯道、同善社、祖师道、大刀会、十八王爷、十八帮、红帮、三仙党等8种会道门。这些封建会道门以讲经传道、聚众拜忏、驱鬼治病、拜神消灾及求子等手段愚弄群众、诈骗钱财，甚至奸淫妇女。1949年查有78坛会道门，大小道首96人，会道徒1372人；一方面，帮会成员不以加入帮会为耻，也不避讳自己的帮会身份。以前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子女的帮会规矩在近代几乎绝迹。人们将加入帮会视为平常之事，看作是人生的选择之一；一方面，一些帮会组织光明正大地在政府机构中登记注册，以中华道德总会，民众协进会，某某公司或研究会等名义公开活动。他们举办慈善活动、进行正常的经济活动、开展文化教育交流、公开物色培养下一代帮会骨干，与暗地活动并行不悖。黄、杜、张等大亨通吃黑白两道就是近代帮会公开性的明证。

近代帮会的第二个新特点是联合性。古代秘密会党大多有“排他”性，即排斥自己组织之外的同类组织。而在上海小刀会起义中，能够实现帮会组织大联盟，实属罕见——尽管这种联盟始终是松散的，未能达到真正的集中统一指挥。上海地区帮会组织能够结成大联盟，反映出上海一带城乡社会下层的众多秘密团体具有共同价值和目标。在共同目标指引下，各个帮会组成了广泛的、松散的、暂时的联盟。反压迫、谋利是最主要的两大共同点。

在小刀会起义中，刘丽川两次托人带信积极与太平天国联络、派遣闽帮首领李咸池独自乘船赴厦门，与厦门小刀会起义军联络，都说明上海小刀会重视与多种反清力量的联盟。小刀会能够组成帮会大联盟，既与其骨干力量是来自闽、粤的“客民”分不开，又与上海五方杂处、商贸繁荣的环境分不开。近代的移民和经济文化交流，克服了狭隘的地区意识；五方杂处的环境，助长了上海帮会组织的宽容，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古代秘密会党的“排他性”。这些都反映出传统的秘密组织洪门，适应时代与环境的演变而寻求自身改



江

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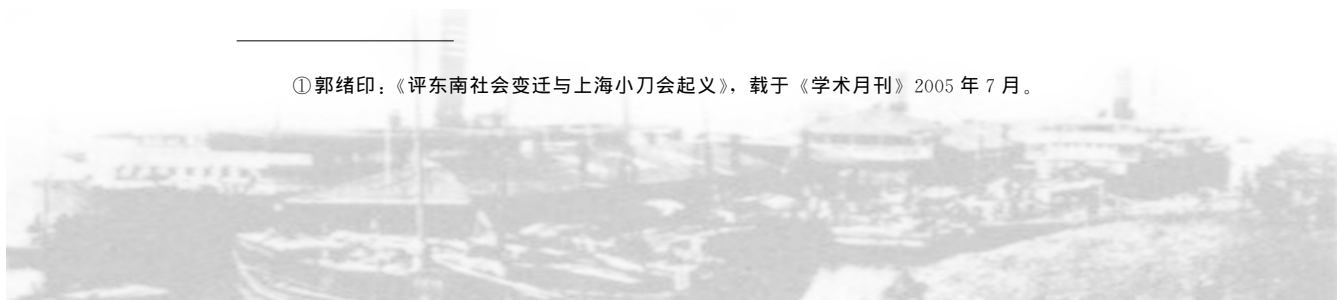
中
国
近
代
帮
会

飘荡于江湖……
生存与正义，死亡与游戏，主流抑或非主流，在刀光剑影中，
都慢慢倒下。裹上历史的尘埃，没有人明白，有这样的一群人曾经

变，在思想与实践上有了某些进步。^①

重视商贸是近代帮会组织的第三个新特点。古代帮会成员几乎都是游民、破产农民、小手工业者，缺乏长远的目标。帮会活动具有破坏性、散漫性、冒险性等特点。以上海帮会为代表的近代帮会组织虽发端于古代帮会，但却与中外通商后的新环境相适应。近代外国经济侵略从多方面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步伐，繁荣了商贸发展。一方面是受近代商贸环境熏陶，另一方面是帮会领袖人物中就有商人出身的。如小刀会的刘丽川、林阿福、陈阿林等人所从事的职业中，都与商贸、洋行有关。社会环境与领袖人物自身的经历，使上海帮会组织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游民的破坏性、散漫性与农民的保守性的传统，主动参与商业贸易，通过各种经济活动获取利润。多数帮会组织和领袖人物都参与经济活动，甚至成立行业协会，升级为行业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否认一些组织和个人是以近代经济形式来掩盖帮会秘密经济，但多数人、多数时间里帮会参与近代商贸是出于适应新形势发展的新特点。

^①郭绪印：《评东南社会变迁与上海小刀会起义》，载于《学术月刊》2005年7月。



第三节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

——近代帮会的归宿

近代帮会组织的兴盛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在判断帮会组织的封建迷信性质外，中国共产党也承认帮会组织是“互助团体”和“群众组织”。1926年，毛泽东认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虽然沦为流氓无产者，但他们所组织的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属于“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页）。在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注意发挥近代帮会组织的正积极作用，联合帮会势力共同进行革命武装斗争。实践证明，部分帮会组织在民国时期站在了人民阵营一边。一些帮会成员热情支持、参加革命活动，有的还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和人民军队，重新回到了正常社会轨道。

但在新中国成立后，帮会组织迅速消失。一方面，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国家的重新稳定发展，抽走了帮会组织所依存的社会土壤。百废待兴、欣欣向荣的新中国散发出迷人的吸引力，旧的非正常社会难以为持；另一方面，帮会组织封建迷信的消极一面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开始发挥作用，产生了恶劣影响。已有的帮会组织大半被特务利用，成为了与人民政府为敌的反动组织。除散布封建邪说继续欺骗群众、为非作歹外，帮会组织还针对土改、镇反、抗美援朝、参军等各项中心工作制造政治谣言，煽动群众对抗人民政府的政策



江湖

中国近代帮会

飘荡于江湖……
生存与正义，死亡与游戏，主流抑或非主流，在刀光剑影中，都慢慢倒下。裹上历史的尘埃，没有人明白，有这样的一群人曾经……

016

法令。新政府采取了坚决取缔反动帮会和会道门组织的政策。一大批帮会分子遭到了法律制裁，成千上万成员争相退出。近代帮会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处境日窘。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帮会历史开始步入衰亡。

张皓，张子琴的文章《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帮会政策的演变》^①是全面、详细论述中国帮会在新中国初期衰亡历史的文章。该文记载了解放初期各地帮会组织的繁盛。青帮“在西安之分布，似极普遍，开堂收徒者近千人，收徒在100人以上者亦有四五十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上至政府之中的职员，军人中的中下级干部，商人、工人乃至地痞、妓女，均系有入会参加其活动者。”^②而重庆袍哥达500余社，“人数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七、八十，真正职业袍哥估计将近10万人”。^③

如何处理膨胀庞大的帮会势力？这直接关系到新的人民政权能否安稳建立，并顺利接管全国。新中国为了顺利接管城乡，尽量争取并稳住帮会。1949年1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国民党、三青团及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的文件，将国民党、三青团、民社党、青年党及其他反共反人民的党派团体和军统、中统及与此性质相同的特务机关列为反动组织。各种帮会不在其列，以便稳定帮会组织，团结其中积极成分，孤立和打击最反动的敌人。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上海市政府对杜月笙的处理。毛泽东于1949年2月18日指示华东领导人，明确把青洪帮头子杜月笙列为“上海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之一”，作为团结对象，以“打击国民党死硬派，便利我们向南进军”。远在香港的杜月笙虽然人已离沪，但关照徒弟安分守己。与此相似，中共华北局于1948年12月13日规定：“对于青洪帮等流氓头子，可以在适当时机，通过某些私人关系警告他们，不许他们抢劫破坏，如敢故违，我军入城之日，必予查究。”在西南，第二野战军设法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帮会头目

^① 载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帮会要录》，档案出版社1993版，第159页。

^③ 赵清著：《袍哥与土匪》，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20页。